

学术 视点

# 为杨振宁先生塑像

吴为山

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人物。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我向杨振宁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造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创作的鲁迅、费孝通、吴作人塑像。杨振宁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问题阐释的深刻性使我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杨振宁先生表示:等我们熟悉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相识,我的理解是相知。人之相知,贵心相知。我能知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感到好奇与兴趣的是他所谈的美。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他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到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既直接又十分复杂。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年-1984年)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 Heisenberg, 1901年-1976年)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使人感悟到他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振宁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振宁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振宁先生对我的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中指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3000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微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振宁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

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信心。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充满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为他塑像,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面对面地塑像。在场的熊秉明先生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浹背。杨振宁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泥塑稿出来后,他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在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10年,在北京,我再次面对面地为他塑像。翁帆女士和我的夫人在场,杨振宁先生泰然自若。两小时,面对一尊塑就的胸像,杨振宁先生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说:“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塑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振宁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振宁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塑像中那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饱满的天庭、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

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仁立于图书馆大厅,或坐落于大学草坪,或端坐于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塑像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着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含了儒家关注的现世之道,也包含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他的气象里,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

杨振宁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曾这样写道: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可见,中华文明之魂已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在他的塑像落成于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

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振宁先生心中的分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振宁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做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回顾与杨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艺术与科学的灵魂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一生成就时,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髓,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

近20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他的家中,聆听他真切、睿智的话语。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了信心与期待。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振宁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眸,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



▲2001年,吴为山首次为杨振宁先生塑像。

## 评序 专栏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不知道为什么,读《向北方》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着金子美玲的这些诗句。

1948年到1949年间,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北上的历程,不就像那些小草、萤火虫和孩子们一样,无所畏惧地向着光明勇敢地前行吗?

北上,是民主党派向着明亮那方前行的历史性选择,是新中国成立前消息归海、天下归心的生动写照,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旅程。北上,也是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博大胸怀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里程碑。这是《向北方》一书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的真理。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对《向北方》一直有着特别的亲切感。因为对于大的历史背景,我们早已经烂熟于心。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为顺应尽快实现和平的民意,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达成了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等共识。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暗地里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此举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雷洁琼、徐伯昕、赵朴初、严景耀等2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公开亮出了反内战、争和平、促民主的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团结联合上海各界各阶层群众和67个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马叙伦、雷洁琼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毒打。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当天深夜赶往医院探望。毛泽东和朱德也打电报表示慰问。“下关惨案”让人们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也让各民主党派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息。马叙伦对周恩来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在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的基础上,于1947年七八月间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面对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党穷凶极恶,进一步强化白色恐怖,加剧迫害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大部分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秘密前往香港,一些进步的各界人士、社会贤达也纷纷避居香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等也在1948年初来到香港,香港很快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聚集之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颁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革、民盟、民进、民促、民联、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联合通电的方式响应中共号召。

5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举行理事会会议,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不仅应谈更应行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认为“五一口号”“为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表示要团结在“五一口号”的周围,形成巩固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誓为实现此高尚的目的而奋斗不懈,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召开,进而有步骤的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的6月和7月,民进在香港先后召开了三次理事会,分别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对新政治协商会议施政纲要的意见,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提出新国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各阶级民主联合政权,必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领导,人民享有各项基本自由,各级政府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解放军亦即国家之武力,实行土地改革,促进工业生产现代化等政策。

虽然对于以上的历史背景相对熟悉,但是对于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之下,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秘密、安全地实现北上的许多细节,过去的文献却并不多见。所以,读到《向北方》这本书,的确如获至宝。据了解,这本《向北方》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李红梅、刘仰东两位研究员在筹备《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览的基础上,通过研读大量的珍贵史料,爬罗剔抉,钩沉梳理,并且亲自赴北京、黑龙江、天津、山东等实地考察之后撰写的。这本书全面、细致、真实地呈现了由香港去北方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非凡过程。

《向北方》通过翔实的史料告诉人们,北上的确不是一段一般意义上的旅程,而是一段伟大的同心同行的精神之旅。北上的途

# 向着明亮那方

朱永新



中看似没有战场的硝烟弥漫,但同样布满风险,可谓波谲曲折、惊心动魄。当时国共两党的部队正在沙场进行战略决战,通过陆路或空中直接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几无可能,最后只能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海路运送,而运送路线因战事变化也不断调整。

不同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关注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北上的具体过程。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是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位民主人士,他们通过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经过15天的海上旅程才到达哈尔滨。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第一批人数更多,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邱仰、陈其尤、侯外庐、翁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等,其中马叙伦和许广平是民进会员。爱好摄影的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为这次旅程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第三批北上的是以李济深为首的民主人士,他和朱蕴山、彭泽民、茅盾等20多位民主人士随行,在圣诞之夜以“金蝉脱壳”的方式离开香港前往大连。第四批北上团以《庄子》的《知北游》命名,这是叶圣陶先生在开船次日为大家出的谜语之谜底。在27人的成员中,叶圣陶和郑振铎为民进会员,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为这次旅程留下了翔实的文字记载。此外,民进创始人之一王绍鏊先生在中共安排下由香港经西朝鲜湾的南浦港到达哈尔滨。

作为教育学者,我对其中达德学院师生北上的一幕尤其感兴趣。这也是教育史上很少提及的史实。达德学院不仅是香港地区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应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1946年的香港,聚集了许多受国民党迫害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为了安置好这些人,并且为未来新中国培养人才,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提议下,在香港建立了这样一所正规的高等学府。达德学院由蔡廷锴先生捐赠房产,聘请陈其瑗先生担任院长,邓初民、翁伯赞、胡绳、杨东纯、钟敬文、侯外庐、陶大镛、章乃器一大批知名学者担任教授,马叙伦、冯乃超、乔冠华、何香凝、郭沫若、周而复、夏衍、戴克家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校讲学,可谓名师云集、群星璀璨。学院先后招收800多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49年被港英当局无理取消注册后,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将其其中优秀的教师和学生送到解放区,他们也成为北上队伍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1949年3月21日,一支由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达德学院学生组成的250人的浩荡大军,搭乘“宝通号”从香港启程前往天津,民进会员徐伯昕也在其中。

据参与运送工作的同志回忆和两位作者的考证,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运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共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177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1/4。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北上这段历史,新中国和新政协的建立都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本《向北方》出版后得到了广泛好评,被中宣部作为主题重点出版物,同时被中国版协等评为“中国好书”月榜图书。这本书也成为各民主党派了解自己的前辈在香港和北上过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感谢两位作者,用生动细致的文字描述、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精心设计的历史地图,为我们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峥嵘岁月。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 谈文 论艺

# 乡村旅游新使命 助推乡村文化新发展

陈丹

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十九大以来的重要国家战略,旨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恢复与振兴上,亦有着新的使命和担当。文化具有公共性,对乡村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特殊力量,乡村旅游在解决乡村文化衰落、传统文化消解等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 发展乡村旅游 塑造乡村新文化

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从事乡村旅游的村民可以在地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不断更新乡村本土文化。把当地农村的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活动进行有机的融合,塑造出适应新的社会关系和发展趋势的乡村新文化。

传统村落、文化名村、特色民族村寨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都可作为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积极发

展乡村旅游,从乡村社会和乡土生活中剥离传统的文化符号,再通过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梳理、筛选、提炼出新的文化符号,从而实现乡村新文化的塑造。

### 开展民俗活动 传播乡村文化

乡村旅游特色民俗活动的繁荣以及融媒体迅速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契机。“乡土个性”是乡村旅游的生命线,通过将质朴的乡村生活融入到旅游活动中,一方面能够满足游客们“回归乡村”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可更好地带动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利用新兴传播媒介来宣传乡村旅游,为当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平台。通过电视、平面、网络等媒体对乡村旅游开展多方位宣传,使得更多人了解当地的社会组织、居民建筑、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生活状态等,有助于农耕生产中的本土文化、农业技艺中的衍生文化以及乡村生活中节庆与仪式文化的传

播范围也会更加广阔。

### 关注旅游体验 彰显乡村文化的地方特色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发展,乡村景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旅游为中国的乡村带来了大量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们对乡土风情等的旅游体验将是乡村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不仅仅只是了解中国、回归乡上的旅游方式,其体验性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切入点。

“地方性”是保留乡村文化多元价值不可缺少的土壤,因此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划中,应关注游客的旅游体验,寻找具有地方性的乡村文化内涵,将其融入乡村旅游体验活动中,以丰富乡村文化建设。

### 推动全域旅游 为乡村文化共享提供保障

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域旅游的发展为乡村文化的共享提供了保障。乡村振兴的发展不仅要以经济发展为“体”,还应以文化共享为“魂”,立足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主客共享的乡村文化家园。

全域旅游的推进,并非盲目地建设旅游景区,开展旅游规划,更需要凸显富有地方个性的文化传统。中国乡村在经历了长期的礼俗教化后,形成了基于农耕经济的良好文化传统。以村落节庆、生产互助、村规民约等民俗传统为传承载体的旅游活动,可以使中华文明更好地绵延。传统的乡村文化,将在全域旅游的发展背景下得到共享、尊重和延续。

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乡村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我们需要不断上下求索,研究出有效办法,探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挖掘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中的文化宝藏,使其充分助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学院)